

结交一言重 相期千里至

——写在中美关系建交 27 周年之际

● 倪世雄

2003 年 11 月 21 日，温家宝总理于访美前夕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先生的采访。谈话一开始，温总理就引用二句中国古诗“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①高度评价中美两国经过磨难而发展起来的友好与合作，向美国人民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在中美建交 27 周年之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心里升腾起许多感慨和思考，同时也产生了不少期待与希望。

^① 这两句古诗引自唐朝诗人虞世南的诗作《结客少年场行》，全诗如下：“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声利。共矜然诺心，各负纵横志。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绿沉明月弦，金络浮云轡。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少年怀一顾，长驱背陇头。熠熠戈霜动，耿耿剑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云起龙沙暗，木落雁门秋。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

27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起伏跌宕的曲折过程，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初步发展，打下基础 (1979年—1989年)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两国关系实现了完全正常化，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邓小平同志高兴地出席了中美建交招待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1979年—1989年中美建交后第一个十年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的十年，他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并以极大的热忱和努力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

1979年1月28日—2月5日邓小平同志对美国进行了一次十分成功的正式访问，这是中美建交后的第一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亲自选择1月28日（农历羊年正月初一）赴美访问，寓意美好吉祥。《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深切的评述：“如果说，北京刚刚在鞭炮声中迎来了新春佳节的话，那么，华盛顿的礼炮声则迎来了中美关系史上的新时代。”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总统举行了三次会谈，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内容包括互设领事馆、互派留学生、能源开发、高能物理研究、空间技术开发和农业发展等合作交流。邓小平强调，这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刚刚开始。

确实是这样，在邓小平访美后两年内，两国就签订了 35 个协议，推动了中美高层互访、经贸合作、文化科技教育交流和民间交往。在此后的几年里，这些互访交流合作的势头不减，为中美两国的高层接触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中美建交时，两国贸易总额仅为 24.5 亿美元。建交后第二年，1980 年 1 月美国参众两院先后批准了中美贸易协定，该协定规定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促进了两国贸易的发展。中美贸易额 1981 年达 55 亿美元，比 1980 年增加 14%。^① 1985 年两国贸易总额升至 77 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 21% 以上。^② 到 1987 年底，中美贸易总额为 78.58 亿美元；美国对华私人投资协议金额达 30.4 亿美元，名列外国对华投资的首位；1987 年，美国访问中国的旅游者达 30 万，中国留美的学生和学者 1980 年从零开始到 1987 年达 3.2 万人。^③ 1988 年和 1989 年两国贸易额骤增，1989 年达 194 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第十大贸易国，美国在华投资项目有 1300 多个，协议资金总额为 43 亿美元。^④

可见，1979 年至 1989 年是中美两国关系初步发展的十年。在这期间，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波折，如在台湾问题上从

^① 刘连弟、王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 年版，第 72 页。

^② 刘连弟、王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97 页。

^③ 刘连弟、王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62 页。

^④ 谢希德、倪世雄主编：《曲折的历程——中美建交 20 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6 页。

“与台湾关系法”到“八·一七联合公报”的斗争，但是，中美关系的主趋势是发展的，主流是好的。十年的初步发展为两国关系打下了基础。没有这一最初的基础，中美关系能经受“六·四”政治风波引发的严重危机而不致破裂，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二、曲折发展，趋于成熟 (1989年—1999年)

1989年到1999年第二个十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三场重大危机的考验，出现了三次大落大起的曲折变化。

1. 第一场危机发生在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以后。由于国内外局势风云突变，中美关系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调整对美政策，结束全球对抗。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也在加快。这表明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美关系赖以发展的战略基础——对付苏联威胁——开始动摇。中美关系战略基础的这一“脆弱性”和“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对两国关系形成巨大的冲击。美国以“尊重人权”和“关心民主”为借口，严重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公开支持中国的民进分子，单方面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经济制裁，并以把人权、军售和经贸与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为手段，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中美关系急剧变化，跌入了谷底，濒临破裂的边缘。

在中美关系处于危急的这一历史时刻，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以他特有的智慧、胆识和影响，亲自指导和帮助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处理危机中的中美关

系，使之化险为夷，出现转机。10月31日，邓小平接见了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对尼克松说：“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还请尼克松转告布什：“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①12月9日，布什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秘密特使访华。尽管退休后已经宣布今后不再代表党和国家会见客人，但为了帮助中美关系摆脱危机，邓小平还是决定第二天会见斯考克罗夫特。邓小平指出：“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②在谈判结束时，邓小平令人感动地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个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邓小平与斯考克罗夫特的特殊会见是他最后一次会见美国客人，他发表的“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谈话，深刻地阐述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对中美关系摆脱危机、得到改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但是，中美关系的修复过程是缓慢的，困难的。从最惠国待遇到人权，从贸易赤字到知识产权，从地区安全到核不扩散，从西藏问题到台湾问题，摩擦接连不断。其中人权问题和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33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

台湾问题周期性地困扰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六·四”政治风波后，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是中美之间“不可谈判的问题”。1993年1月20日，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入主白宫。5月2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一项总统行政命令，坚持人权与最惠国待遇脱钩。虽然同意延长1993—1994年度的对华最惠国待遇，但却附加了7项人权条件：停止对美国的劳改产品出口、实施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贸易修正案》所规定的自由移民要求、释放政治犯、确保犯人的人道主义待遇、对国外的电台和电视节目开放、保护西藏宗教和传统文化、加入联合国两个国际公约即《社会、经济与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时，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些条件。两国关系随之在人权问题上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克林顿政府提出“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江泽民主席应邀参加1993年11月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西雅图会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首次会晤。江泽民主席提出，应以“认真、积极、向前看”的态度对待中美关系。中美首脑的西雅图会晤取得了重大成果，基本结束了“六·四”后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并打破了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僵局。先是从“不可谈判”变成“可谈判”，后又从“挂钩”变为“脱钩”。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总统签署又一项总统行政命令，宣布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脱钩。他表示要与中国扩大交往、扩大贸易、扩大在国际上的合作，携手建立一个长期的战略关系。与此同时，他还决定延长对中国采取的部分制裁，禁止从中国进口枪支弹药，以及着手实现一项新的旨在支持中国境内“人权和民主人士”的计划。5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声明，对

克林顿“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和“与人权问题脱钩”的决定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政府尽早解除所有对华制裁，停止对中国内政的任何干涉行为。5月31日，克林顿总统撰文谈美中关系，指出中国是亚洲乃至全球安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多年来“人权同最惠国待遇挂钩已把我们带到了尽头”，“我们已不再实行两套对华政策——国会一套和总统一套，而实行美国唯一的一套对华政策。”^①美国总统专门撰文谈对华政策，这在美国历史上尚不多见。

至此，经历了近五年折腾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经贸、军售三挂钩问题终于划上了句号。当然，“三脱钩”不等于“三解决”，中美在人权、经贸、军售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但是，从“三挂钩”到“三脱钩”无疑是一个进展，有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报刊称此举使中美关系进入“超越最惠国待遇”阶段。

2. 上述人权危机周期刚刚过去，台湾问题就凸显出来，发生了1995年的第二场危机。继1994年9月美国政府进行对台关系升格的一些程序性调整后，美国政府出尔反尔，从最初反对到后来同意给李登辉访美签证。李登辉于1995年6月以所谓“私人身份”访问了美国，在康乃尔大学发表演说，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主权在民”、“突破外交困境”云云。美国政府同意李登辉访美，严重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助长了台独势力，恶化了业已改善的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

^① Bill Clinton, "To Isolate China Can not Improve Human Rights Status," *Los Angeles Times*, May 31, 1994.

5月23日,钱其琛外长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钱外长指出,不管李登辉以什么名义和方式访美,都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是损害中国主权利益、破坏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严重行为。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表措词严厉的抗议声明。

6月8日,在会见克林顿总统时,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严正指出,当务之急是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停止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以避免给中美关系造成进一步的严重损害。6月16日,中国政府召回李道豫大使述职,两国关系自1979年建交以来第一次出现双方无大使的局面(美驻华大使芮效俭因任期结束回国),中美外交关系实际上“降至代办级”,这是1979年建交以后两国外交关系的最低点。

与此同时,中国还采取了一些直接针对台湾地区但间接针对美国的措施:6月16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第二次汪辜会谈不能如期举行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当局鼓吹国家分裂、蓄意制造两岸紧张气氛,使原定于7月份的第二次汪辜会谈不能按期举行,这完全是由台湾一手造成的。中国于7月21—26日和8月15—25日两次在东海海域进行导弹发射演习和导弹火炮实弹射击演习。这被海外称为“文攻武威”,对李登辉等人制造国家分裂、鼓吹台湾独立产生了有力的制约作用。

在中美这场围绕台湾问题的较量中,中国政府始终进行了“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变被动为主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终于使危机中的中美关系出现转机。

10月24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的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正式会晤,这是1993年以来中美首脑的第三次正式会晤。由于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出现

“大落”，这次会晤引起世界舆论的格外注目。

会晤时，两位领导人认为，1994年11月14日雅加达会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的困难和动荡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近两个月来，两国之间进行的接触和磋商对中美关系的恢复有积极意义。江泽民主席重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仍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他还强调指出，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不希望看到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受到干扰的事件再次发生。克林顿总统表示，一个强大、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中国孤立、对抗、遏制，都不是选择，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才是唯一的选择。美国重申依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作出了“三不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任何“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意图，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此外，还确定台湾领导人今后访美应遵循私人的、非官方的、很少的、个案处理的四点原则。同时，双方拟在五个领域加强合作：环境问题；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经贸合作问题；两军交往问题；寻求恢复和扩大对话的领域。

中美两国首脑在纽约正式会晤取得了成功，由于这次首脑会晤对中美双方都很重要，原定半小时的会晤进行了一个半小时，这在前两次会晤中是没有过的。它是一次坦诚、友好、积极、有益的会晤，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使中美关系结束“大落”状态，出现“大起”势头。新闻界则称这次会晤“显示出中美关系雨过天晴的好迹象”。

1996年是美国的又一个大选年，也是中美关系的调整年。中美关系的气氛明显改善，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恢复迹象。

从5月份开始，美国政府领导人从克林顿到其他高层官员

连续发表讲话，强调要从战略高度认识中国的地位和影响，要接触中国，而不是遏制中国。克里斯托弗国务卿提出“对华三原则”：支持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稳定、开放和成功的国家；支持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在谋求通过对话和接触处理同中国的分歧的同时，要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保护美国的利益。^①5月20日，克林顿总统比往年提前多日宣布无条件延长给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接着，美国国会异常顺利地批准了克林顿总统的决定。这是近几年来未曾出现过的积极变化。

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访华取得圆满成功。据有关报道，莱克在会见江泽民主席时用中文背诵了“减少麻烦、增加信任、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方针，江主席大加称赞，用英文说“Marvelous”（好极了），并手书“心诚则灵”四字赠之。同年11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对中国的成功访问是1996年美国高层访华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江泽民主席在会见他时表示希望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发展。11月21日，克里斯托弗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21世纪的合作”的政策性演讲，从全球、区域和双边三个领域分析了中美关系面向21世纪的合作前景。此间舆论指出，克里斯托弗的中国之行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又一有力的举动。

随即，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马尼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自1993年西雅图会晤以来的第四次会晤。会晤的气氛是积极的、友好的和建设性的。两国

^① Warren Christopher, "American Interests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New York Times*, May 17, 1996.

首脑商定，将分别于1997年和1993年进行正式互访。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国家元首举行最高级会谈，就中美关系、国际形势和双方关系等重大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双方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确定了中美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的目标。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先后参加了40多场活动，发表了30多次演讲和讲话，与美国国会、政府及其他各阶层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从而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中美关系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11月4日，江泽民主席在访美回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访美达到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目的。

时隔半年多，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对中国进行了回访。在8天时间里，克林顿总统一行访问了西安、北京、上海、桂林和香港。6月27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北京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江泽民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克林顿总统表示，希望此行有助于扩大双方合作的领域，缩小分歧，增加了解，从而进一步发展中美两国的友好伙伴关系。^①两国首脑还发表了三份重要的联合声明：《关于防止南亚核及导弹竞赛的联合声明》、《关于“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的联合声明》和《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些声明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和平与稳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 《人民日报》，1999年6月28日。

3. 中美两国元首 1997 年和 1998 年的成功互访, 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小高潮。然而, 好景不长, 1999 年上半年, 中美关系又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1999 年初, 美国出现针对中国的“核盗窃”谣言, 并抛出影响中国安全利益的 NMD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和 TMD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一切, 理应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同年 4 月 6 日—14 日, 在中美关系出现局部“回潮”时, 朱镕基总理按原计划访问美国, 这是中国总理 15 年来首次访美, 取得了积极成果, 对稳定中美关系起了重要作用。然而,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朱总理访美回国一个月不到, 随着科索沃危机的升级和南斯拉夫战争爆发, 5 月 8 日我国驻南使馆被美国导弹击中, 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就炸馆事件对美国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 并提出最强烈的抗议。5 月 8 日和 9 日, 中国爆发全国性声讨美国炸馆暴行的示威游行, 显示了全国人民反对美国新霸权主义的坚定决心。5 月 10 日, 中国政府再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决定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 推迟中美防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和中止中美人权对话等。^① 5 月 14 日, 应克林顿总统的要求, 江泽民主席与他通了电话。克林顿总统再次表示由衷的道歉, 保证查清炸馆事件发生的原因, 并尽快通报事实真相。他说, 美中关系非常重要, 他将尽最大努力处理好这场悲剧, 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江泽民主席严正指出, 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了要求, 美国政府应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彻底、公

^① 刘连弟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 年—2000 年大事纵览》,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53 页。

正的调查，迅速公布结果，严惩肇事者，满足中方全部要求。^① 6月17日，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强调说，目前中美关系受到很大的伤害，美国应负全部责任，修补裂痕的关键是美方要做出全面的交待，这是当务之急。^②

面对中美关系的这场突发危机，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根据小平同志关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思路，沉着冷静稳重地处置了这一场危机。当时，江泽民同志果断地提出“斗而不破”四字方针。“斗”就是和美国的霸权主义作坚决斗争，讲原则性；“不破”则是中美关系不能破裂，要千方百计地尽最大努力维护之。“斗而不破”的方针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结合，终于使中美关系再次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紧张的中美关系逐步走出“炸馆事件”的阴影，得到缓解。7月10日，克林顿总统专程去观看了女足世界杯决赛的中美女足比赛，并与中国女足队员合影。他希望这场比赛有助于缓解中美的紧张关系。第二天，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还就中美两国女子足球队取得优异成绩互致贺信。9月11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参加新西兰奥克兰 APEC 会议期间举行了正式会晤。克林顿总统利用这次机会，第一次当面向江泽民主席就“炸馆事件”表示道歉，双方就中美关系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在不少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双方表示愿意共同努力使紧张的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随即，中美恢复了关于中国人世的双边谈判，继9月下旬华盛顿谈判后，移师北京。同年11月9

① 《人民日报》，1999年5月15日。

② 刘连弟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日至 15 日, 经过六天日以继夜的艰苦谈判, 终于取得双方满意的结果。石广生部长和巴尔舍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 WTO 的双边协议。11 月 15 日下午, 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美国政府代表团, 说: “有志者, 事竟成”, 双方终于签署了协议, 取得了“双赢”结果。这一协议有利于促进中美经贸合作的全面发展, 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① 12 月 16 日, 经过多轮谈判, 中美两国政府就“炸馆事件”的财产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美国赔偿中国 2800 万美元。此前, 双方于 7 月 30 日已就人员伤亡赔偿达成协议, 美方赔偿中方 450 万美元。赔偿问题的基本解决, 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恢复。

1989 年至 1999 年这十年间, 中美关系可谓危机不断, 多灾多难。但中美关系在克服困难、度过危机后又继续向前推进, 而且变得成熟起来。

三、调整发展 保持势头 (2000 年—2002 年)

这一阶段时间不长, 才三年, 但具有重要意义, 它是世纪之交的三年, 也是中美关系承上启下的三年。

2000 年美国大选, 小布什总统入主白宫。最初, 中美关系在战略定位和台湾问题上一度出现紧张态势。2001 年 4 月 1 日又发生了撞机事件, “雪上加霜”。然而, 同年的“9·11”

^① 《人民日报》, 1999 年 11 月 16 日。

事件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机遇，中美面临着新的共同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反恐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催化着中美关系的新调整。

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双塔遭受恐怖袭击后，江泽民主席即刻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布什总统、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慰问，并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9月20日正在美国访问的唐家璇外长表示，美国遭受恐怖暴力袭击事件，不仅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灾害，也是对全世界渴望和平的人民的挑战。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站在一起。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对话与合作。^①10月19日，在上海APEC会议前夕，江泽民主席和小布什总统在上海西郊宾馆进行了三小时的正式会晤，之后共同会见记者。江泽民主席强调，中美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国家，在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推动地区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以及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都拥有共同责任和利益。中国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愿与美方共同努力，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小布什总统说，美中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是我们面临的共同威胁，美中应携手合作，来打击共同的威胁。他还指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愿意同中国一起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②“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七个字，说明中美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和调整，双方表示在反恐斗争的新形势下，把中美关系朝着建设性合作关系的目標继续向前推进。

① 《人民日报》，2001年9月21日。

② 《人民日报》，2001年10月20日。

2002年,中美关系出现了比较好的态势。当年,笔者曾参加中美知名人士会晤代表团去美国访问。在会晤中,双方很容易找到共识,都认为在21世纪新的形势下,中美两国面临着和平与发展两大任务,面临着反恐、防扩两方面挑战。中美有很多理由进行合作,而没有任何理由进行对抗。双方还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应该抓住它。尽管中美关系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双方应该求同存异,谋求发展。毕竟情况比以前大为改观了,中美两国的关系明显改善,中美发展合作的有利条件明显增多。

2002年2月21日至23日,小布什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重要访问,这是他四个月内的第二次访华,而且亲自选定了2月21日出访,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形成历史性的一致。两国元首在充实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方面达成重要共识:1. 双方应进一步加强高层战略对话以及各级别、各部门之间的接触,增进了解和信任;2. 双方应加深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造福于两国人民;3. 双方应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彼此间分歧,特别是台湾问题;4. 双方应当把中美关系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应经常沟通,加强合作。^①

同年4月底5月初,胡锦涛副主席应美国副总统切尼邀请访问美国,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产生重大影响。在与小布什总统会见时,胡锦涛副主席说:“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小布什总统

^① 《人民日报》,2002年2月22日。

则回应：“美国政府和我本人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美中两国都是大国，双方开展合作对两国和世界极其重要。”^①

同年10月22日到25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他作为国家主席的最后一次访问。这次，他去了小布什总统的克劳福德农场。这是一年内江泽民主席与小布什总统的第三次会晤。江泽民主席与小布什总统就台湾问题、朝核问题、经贸问题和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坦率、友好地交流了意见。江泽民主席说：“中美的合作扩大了，相互信任加深了，两国关系出现了好的发展势头。”小布什总统说：“中美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我希望我们两国能建立强有力的友好关系。”江泽民主席回到北京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新世纪 新形势 新行动”的重要社论。社论指出：“这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新条件下，在全国各族人民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重要时刻，中国领导人的一次重要出访，中国在外交上采取的一次重大行动。”重要时刻、重要出访、重大行动，这三个“重”显示出江泽民主席这次访问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性。正如这篇社论指出的：“中美关系的发展应该登高望远，面向未来。在承认世界多样化的基础上，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平竞争，取长补短，努力实现共同进步。”^②

可见，2002年，中美最高领导人的三次重要访问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调整发展的势头。

① 2002年5月2日新华社华盛顿电。

② 《人民日报》，2002年10月30日。

四、平稳发展 合作双赢 (2002 年—)

2002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召开了十六大，平稳顺利地实现了新老交替，产生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三年多来，中美关系在原来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事实证明，中美关系目前处于建交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2003 年 5 月底、6 月初，胡锦涛主席参加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国家首脑和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在这期间他与小布什总统进行了中美高峰会晤。小布什总统对胡锦涛主席说：“我认为中美关系是好的，我希望中美关系今后会更好。”他用了一个比较级。胡锦涛主席回答说：“我认为中美关系现在是稳定的，我希望中美关系今后更加稳定。”也来一个比较级。而且胡主席又加了一句“希望中美关系能够长期稳定”。不仅是“稳定”，而且是“更加稳定”，还要“长期稳定”。可见，双方共同认为，应在比较长的时期里，保持一个良好的更加稳定的中美关系，这就是目标。^① 2003 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

① 张德明主编：《世纪讲坛》，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09 页。

评述中美关系“向上飞升”^①后，再次指出：“中美关系处于30年来最高点。……关系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且是稳步上升。”“美中关系处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佳时期。”^②同年11月5日，由老布什总统发起、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乔治·布什图书馆基金会和中国人民友好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美关系研讨会“中美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美国召开，有2500人参加。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应邀作主旨发言，他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不久前说，美中关系处于最好时期，我同意这样的评价，但我愿意补充说，中美关系还应当也可以做到更好。”^③

这一阶段，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主要特点表现为“三个保持”：

1. 高层保持密切接触。2003年12月初，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这是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首次访美，这次访问是一次非常及时、非常重要、非常成功的访问，是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温家宝总理和小布什总统就经贸问题、台湾问题、反恐问题和朝鲜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取得新的共识。当时，笔者恰巧在美国访问，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温家宝总理访美的巨大成功。继2000年11月20日在APEC智利

① 鲍威尔在2003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经历撞机事件的低潮后，通过“9·11”事件后反恐合作和朝核合作，加上双方高层官员的密集互动，中美关系的确已经显著向上飞升。见《参考消息》2003年9月7日。

② 鲍威尔2003年9月5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埃里奥特国际事务学院新楼落成典礼上的演讲，见《参考消息》2003年9月7日。

③ 2003年11月5日新华社科利奇站电。科利奇站（College Station）是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所在地。

会议期间胡锦涛主席与小布什总统会晤后，2005年中美元首又在不同场合会晤了五次，还多次通了热线电话，及时就双方关心的迫切问题和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在智利会晤时，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今后四年的发展对双方均至关重要。胡锦涛主席为此提出保持高层交往、加强两国战略对话、推动经贸等领域合作、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开展磋商和协商的四点意见。^① 2005年11月19日，小布什总统访华，这是他2001年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三次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达成广泛而重要的共识，提出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目标和任务。此外，2005年7月唐家璇国务委员访美。这一阶段李肇星外交部长多次访美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多次访华，赖斯就任国务卿后两个月内与李肇星外交部长通了五次电话，并于2005年3月和7月两次访问中国。2005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这些均是这一阶段两国高层密切接触的重要标志。这里值得提及的是，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访华是对2003年10月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的回访。曹刚川的访问是中国国防部长7年来的首次访美。小布什总统在接见曹刚川国防部长时说：“美方高度重视美中两军关系。”曹刚川和拉姆斯菲尔德两位部长认为，健康稳定的两岸关系符合双方利益。^② 关于拉姆斯菲尔德的回访，舆论普遍认为，两国国防部长进行了“坦诚的、建设性的、有成果的”会谈。胡锦涛主席接见拉姆斯菲尔德时风趣地说，3年前在五角大楼见过你，虽

① 《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1日。

② 《人民日报》，2003年10月30日。

然3年过去了,但你却显得更年轻了。^① 中美国防部长在两年里实现互访,标志着中美两军关系的全面恢复,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2. 外交保持战略对话。在两国领导人的建议和安排下,2005年8月1日至2日,在北京中美举行建交以来第一次高层战略对话,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戴秉国,美国代表团团长是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双方就重大的战略性问题进行磋商、扩大共识、增进了解、协调立场。同年12月7日,双方移师美国华盛顿,又进行了一次高层战略对话,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据报道,双方“只谈宏观问题,不谈枝节问题”,强调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分歧和问题。对话中,针对美方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关切和疑虑,中方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战略。^② 高层战略对话不仅带有建设性,而且突显前瞻性,是中美关系逐步成熟的表现。

3. 合作保持良好势头。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美后,中美之间出现了合作的新势头。2004年1月7日,胡锦涛主席在接见布热津斯基博士时强调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在下降,而是在上升;中美合作的领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接着,他提出了对美方针的新“十六字方针”:“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深化

① 《东方早报》,2005年10月20日。

② 《文汇报》,2005年12月10日。

合作。”^① 其中，核心是从体制和机制上深化合作。赖斯也给予这一势头以积极的评价，她说：“美中关系已从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方式向前发展，双方正就广泛的问题进行着各种合作。”^② 两年来，从经贸到反恐、从军事关系到防止扩散、从能源到司法、从科技到教育、从文艺体育到疾病防治、从政府到民间，中美之间的合作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国合作势头渐隆。2005年11月20日，在会见小布什总统时，胡锦涛主席进一步提出五点建议：（1）保持两国高层交往的积极势头；（2）共同开创中美经贸合作的新局面；（3）加强两国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4）加强两国在反恐、防扩散、防控禽流感问题上的合作；（5）扩大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五点建议的提出，将开拓两国关系务实合作的新阶段。

在看到这一阶段中美关系发展的一面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中美关系困难的一面。总体稳定、局部困难，这是当前中美关系的真实写照。

目前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困难是人权分歧、经贸摩擦、朝核危机和台湾问题。

1. 人权分歧。中美之间的人权分歧源于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要彻底消除分歧是不可能的，但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处理分歧，反对人权双

^① 《人民日报》，2004年1月8日。1992年至1994年期间，江泽民主席在许多场合提出对美“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2004年1月7日，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新“十六字方针”，是在新形势下我国对美方针政策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

^② 《人民日报》，2005年3月22日。

重标准，反对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然而，美国政府总是反其道而行。如往年一样，美国政府于2004年2月25日发表了《2003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世界上1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乱发议论，竭尽歪曲之能事。在谈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时，无视中国的巨大变化，说什么“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仍然不佳，政府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仍很普遍，……在一些关键的人权领域出现了倒退”等。^①接着，3月份美国政府决定在联合国第60届人权会议上第11次提出针对中国的提案。对此，中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应。3月23日外交部长助理沈国放奉命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指出，美方执意挑起对抗已严重破坏了两国人权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中方不得不立即中止双方的人权对话。^②4月15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持公道，在其第60届人权会议上，以28票赞成、16票反对、9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中国提出的对美国提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这是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人权会议第11次挫败美国提出的审议中国人权纪录的图谋。这说明了，美国无事生非，无视中国人权状况的改进和人权事业的进步，丑化中国，向中国施加压力，是不得人心的。

2004年3月以后，中美人权对话中止，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加剧。面对中国政府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立场，美国政府的 attitude 有所转变。2005年3月17日，正在日内瓦参加第61届联合国人权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正式宣布，美国决定不在

① 《光明日报》，2004年3月1日。

② 《人民日报》，2004年3月24日。

本次会议上提交针对中国的提案。中国代表团团长沙祖康大使即刻表示，美国这一决定既有利于中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也有利于两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应该说，这一积极的变化避免了一场中美人权公开对抗，为恢复人权对话营造了良好的气氛。然而，事情的进展往往是曲折的。2005年12月，美国国务院借“国际人权日”发表声明，再次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指责，挑起事端，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 经贸摩擦。这几年，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2004年两国贸易总额达1696亿美元，美在华投资项目4.5万个，投资总额1013亿美元（实际到位488亿美元），按双方统计，超过20%的增长。2005年1月至11月，中美贸易总额为1915.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5.4%。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①在经贸发展的同时，经贸摩擦也有增无减，即这几年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积极发展和摩擦增加的双重趋势。经贸摩擦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1) 贸易赤字。2003年，美方声称，美中贸易赤字已达1400多亿美元，中方认为只有600亿美元，相差甚远。

(2) 人民币汇率。美方指责中国“人为操纵”人民币汇率以进行不公平贸易，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2005年5月17日，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出报告，称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美国有可能实施报复性措施。^②

^① 见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在第二届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讲话，2005年11月14日，北京。

^② 《解放日报》，2005年5月20日。

(3) 知识产权保护。美方认为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方面力度不够,在中国侵权行为四处蔓延,使美国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4) 贸易倾销。美国商务部先后指控中国出口彩电、钢材、家具等存在倾销行为,并不断对此作出反倾销立案,扬言对上述中国商品加征高关税。中方予以反抗,指出美方无理挑起事端,严重干扰中美正常贸易秩序。

(5) 纺织品问题。此事历时已久。2003年11月美方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三种纺织品(针织布、胸衣和袍服)设卡,引起中方不满;2005年5月又开始对中国纺织品实施进口限制,遭到中方反对;6月中旬起中美开始艰巨的纺织品问题谈判,经过七轮谈判,最后在2005年11月8日签署了两国《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纺织品问题得到阶段性缓解,但还不是最后解决。

(6) 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方面提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将其与中国的现行劳工制度、汇率政策和政治体制挂钩,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美方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也成为中美经贸摩擦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按照“平等、互利、双赢”的原则发展中美经贸合作,有助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两国领导人和相关部门十分重视缓解和解决中美的经贸摩擦。2004年4月吴仪副总理访美,落实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访美时与美方就经贸问题达成的共识和原则,与美方签署了8项协议(涉及海运、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食品安全、中小企业合作、商品展览等),成立了6个工作组(研究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美贸易救济措施、农

产品检验检疫、纺织品贸易、知识产权和贸易额统计方法等)。^① 2005年,胡锦涛主席和小布什总统在五国会晤中,每次都涉及经贸问题,并达成新的共识。应该说,中美经贸摩擦仍然存在,但合作还是多于摩擦。

3. 朝核危机。2002年10月3日至5日,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凯利访问朝鲜,向朝方摊牌,迫使朝方承认核计划,从而引发又一次朝核危机。危机之初,双方态势敌对。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再次退出NPT(核不扩散条约),使局势趋于恶化。为了打破僵局,缓和紧张局势,在中国政府及有关国家的努力下,2003年4月举行了三方会谈,接着又扩大为六方会谈。尽管障碍重重,步履维艰,但近三年来还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特别是2005年8月至9月的第四轮六方会谈。这一轮会谈发表的《共同声明》表明各方在解决朝核危机问题上有了新的共识。目前,正是第五轮六方会谈休会阶段,人们期待2006年会给朝核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希望。

应该说,中美在六方会谈框架内解决朝核危机、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维持东北亚安全与稳定等方面持有共同立场。但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在六方会谈框架之外对朝鲜施加压力、实施制裁和意图更变政权。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扣上“邪恶轴心”、“暴政前哨”的帽子是敌视政策的表现,无益危机的缓解和解决。要朝鲜放弃核计划,美国必须从口头到行动放弃对朝鲜的敌视政策,因此,两个“放弃”才是关键。目前,美国应停止对朝鲜的金融制裁并放弃下一步的制裁措施。如果美国走出全面制裁朝鲜这一步,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不

^① 《光明日报》,2004年4月23日。

仅会葬送六方会谈业已取得的积极成果，而且还会危及中美关系。

4. 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具有重要性、敏感性、制约性和危险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台湾问题特别敏感，因为它涉及美国售台武器和“台独”势力的发展。台湾问题也具有制约性，处理不当就会严重制约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台湾问题还有其危险性，一旦失控就会导致中美对抗，甚至于军事对抗。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方面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另一方面却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加强军事关系，提升美台关系；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不断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美国的上述两面性可从其对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政策的提出和对台湾六项承诺的重申看得一清二楚。美国政府当前和未来的两岸五点核心政策是：（1）美国继续在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2）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或单方面改变美国认定的两岸关系现状；（3）大陆不能对台湾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台湾必须谨慎处理两岸关系的各个层面，大陆和台湾都不应单方面采取足以改变两岸关系现状的言行；（4）美国将继续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适当的防御性武器；（5）考虑到台湾可能面对武力攻击，美国将继续维持军力以抵御对台湾的任何形式的压力。^① 美国对台湾的六项承诺是 1982 年“八·一七联合公报”

^①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 2004 年 4 月 21 日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与台湾关系法》实施 25 周年”听证会上所作的证词。

发表前一个多月，即7月14日，里根总统委派时任美国驻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秘密会见蒋经国时所作的，内容是：（1）美国不会设定一个终止向台出售武器的期限；（2）美国将不改变在《与台湾关系法》里所规定的承诺；（3）美国在决定向台出售武器之前不会与北京进行磋商；（4）美国不会扮演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调停人；（5）不公开承认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6）美国不会强迫台湾与大陆谈判。^①这六项承诺发生在20多年之前，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最近几年里，小布什总统和其他高层人士还在加以重申，强调这六项承诺仍然有效。^②了解这一背景，人们对美国政府为什么要继续向台出售武器和最近182亿美元的军售案和小布什总统为什么在2004年6月14日会签署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第2092号法案就不足为奇了。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两面性，实际上包含着危险性。如今，“台独”势力的抬头和蔓延已成为两岸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和危险。

几年前，江泽民主席对小布什总统说：“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深远，太重要了。”小布什总统回答：“美方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湾独立。”^③我们欢迎美国政府这一积极表态。2005年唐家璇国务委员访问美国时提出中美两国应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共同反对和

^① Harvey Feldman, "Taiwan, Arms Sales, And the Reagan Assurances,"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 Vol. XIX, No. 3, Fall 2001, pp. 80-81.

^② 《参考消息》，2004年6月15日。

^③ 江泽民主席和小布什总统2002年10月24日在美国克劳福德农场会晤时的谈话，新华社克劳福德（美国）2002年10月25日电。

遏制“台独””。^①唐家璇的讲话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的建议，反对和遏制台独符合中美两国根本利益，是当务之急，也是避免中美两国因台湾问题卷入冲突和对抗的明智之举。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多次强调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小布什总统称：“美中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关系，非常复杂。”^②赖斯说：“美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复杂的。”^③美国前亚洲协会主席 Nick Platt 认为“美中关系是成熟而复杂的关系”。^④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部资深主任李侃如则指出，由于目前的一些难题和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中美关系面临一段复杂坎坷期。^⑤的确，中美关系中困难与机遇、摩擦与合作交叉并存，其复杂性不仅表现在上述四个困难问题，而且还反映在一个超越这四个问题的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即如何对待中国和平崛起的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美国国内的普遍重视，业已触发新的一场关于对华政策的热烈辩论。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演讲即是一例。在演讲中，佐利克认为3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融入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巨龙出水，

① 唐家璇国务委员在2005年7月27日在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努力推进新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演讲，《东方早报》，2005年7月29日。

② 小布什总统2005年5月31日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参考消息》，2005年6月2日。

③ 赖斯国务卿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的讲话，《纽约时报》，2005年8月19日。

④ Nick Platt 主席2005年11月8日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所作的演讲。

⑤ 见《参考消息》，2005年6月11日。

融入世界。”“我们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不仅仅考虑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打开大门的问题，而且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stakeholder）。”佐利克提出：“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很多美国人担心中国这条龙变成火龙，人们对中国存在强烈的担忧。”^①在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欢迎者有之，支持者有之，怀疑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攻击者有之，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怀疑和反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声音、态度和立场不可轻视，它们不断炮制多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毒化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良好气氛，正在并将会继续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如果视中国和平崛起为威胁，则对华政策的遏制一面就会呈现强势，两国关系也会随之紧张，这当然不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为了让美方对中国和平崛起有一个正确的了解，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纽约参加联合国60周年庆典期间与布什总统会晤时，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布什总统对此表示感谢。中国的和平崛起是顺应当今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它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②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的发展没有也不会妨碍美国的发展和威胁美国的安全。中国反对霸权行为，但不挑战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支配地位；中国主张建立世界新秩序，但尊重美国在现

^① 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Speech at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3日。

存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和影响；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别国内政，但欢迎美国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对中美两国来说，在关于对方的战略定位上逐步形成正确的共识，是一个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问题。今年中美高层接触的密集，战略对话的启动，合作双赢的发展，都表明中美之间形成这一共识虽然仍需时日；但不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相反，将会从积极方面改写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今后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在中美建交 27 周年之际，当我们回顾所经历的风雨曲折，深感中美关系能发展到今天，是来之不易的，其中有许多历史启示值得我们记取。

第一，中美建交 27 年，两国关系经历种种曲折，总的来说，是一直保持向前发展的势头，其特点是困难中求稳定，曲折中有发展。江泽民主席曾说过：“30 年来，中美关系尽管经历了挫折，但总的方向是不断向前发展的。”^① 胡锦涛主席也说过：“30 年来，中美关系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两国关系在广泛的领域内取得历史性的成就。”^② 把握这一中美关系的总趋势对双方都很重要。

第二，中美关系是具有一种特质性的矛盾统一体，即关系发展的持久性和战略基础的脆弱性。中美两国历史背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标准、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差异，常

^① 江泽民主席 2002 年 11 月 20 日为“走向和平与合作之路——尼克松总统访华三十周年展览”作的电视录像讲话，《人民日报》，2002 年 11 月 21 日。

^②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 2002 年 5 月 1 日访美时的讲话，2002 年 5 月 2 日新华社美国华盛顿电。

常表现为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冲突，两国关系基础的脆弱性时时暴露出来，如1989年、1995年和1999年三场危机的发生，以及2001年的撞机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中美关系又具有持久性，因为它重要，中美关系发展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培育持久性，克服脆弱性是中美两国的长期任务。

第三，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处理中美关系，树立全局长远的战略观。这里，笔者不禁想起一段往事：1956年10月6日，在北京西苑机场送走印尼总统苏加诺后，毛主席突然提出要参观由日本民间贸易团体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有关部门匆忙作了安排。毛主席参观后称赞“日展”办得很好，对日本朋友表示感谢。随即与“日展”总裁村田交谈起来。村田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现在苏日恢复了邦交，但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毛主席回答说：“不要急，慢慢来。中日关系中还有一个与美国的关系问题，美国不和我们合作，反对我们，所以也不喜欢日本与我们合作。中国希望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也希望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中美两国的人民是友好的，只是政府的关系不好。我这一代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不好，我上‘西天’以后，我的儿子一代可能好；再不好，孙子一代总好起来的。”^①在中美对抗的冷战年代，毛主席就以这种战略眼光和视野看待中美关系，令人感动。“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今天，中美两国更应登高望远，不断地将中美关系向前推进。

第四，两国应该求同存异，通过对话协商，处理两国之间

^① 参见《文汇报》，2000年7月15日。

的问题和关切。求同存异的基础是两国国家利益的比较分析。中美两国客观上存在着不少利益差异和冲突，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地扩大。中美应努力寻求国家利益汇合点，减少冲撞点，扩大共同点，缩小分歧点。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放一下，不要让在某一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中美关系的全局和总体发展。中美应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摆脱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对两国关系的消极影响，应进一步思考、探讨和比较两国国家利益的同异，树立一种新型的求同存异利益观。

第五，中美应根据互信互利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这个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不断发展的世界里，经济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加强和深化中美经济合作具有特殊意义。中美两国还应加强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的磋商，加强在反恐、防扩散、处理地区热点问题、环保、缉毒、打击走私、防治禽流感 and 救灾工作中的合作。所有这些将推动两国关系从冷战时期对付共同的苏联威胁到冷战结束以来寻求共同的合作基础的转换，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夯实新的支持基础。对中美关系来说，树立互利双赢的合作观极其重要。

第六，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苏联解体、“9·11”事件和中国和平崛起这三大重大历史事件及其过程，对世界产生了历史性影响。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中美两国应该树立与时俱进发展观。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作为两国关系的共同指导，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对30多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公报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准则，如一个中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应该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

越来越感到有必要以与时俱进的思路和精神，克服历史局限性，把中美关系放在经历重大而深刻变化的世界范围内来考虑，放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世界目标上来处理，在 21 世纪里，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作者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牛海彬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吴旻思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赵可金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信 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夏立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倪世雄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